

高晓声研究资料

连云港市教师进修学院编

目 录

传 略

- 曲折的路.....高晓声（1）
关于高晓声.....章品镇（11）

高晓声论创作

- 也算“经验”.....（23）
关于《周华英求职》的通信.....（26）
且说陈奂生.....（28）
《李顺大造屋》始末.....（34）
在《雨花》编委学习“七一”社论座谈会上
的发言.....（43）
扎根在生活的土壤里.....（44）
与连云港市业余作者和教师进修学院学员
谈创作.....（60）
生活和“天堂”（摘录）.....（74）
谈谈文学创作
——给青年作者小说讲习班的讲课（摘录）.....（80）
创作思想随谈（摘录）.....（88）
希望努力为农民写作（摘录）.....（91）

论高晓声的创作

一、专论

- 高晓声小说的艺术特色.....雷 达（95）
听高晓声的“农民”组曲.....严文井（101）

涤荡人物灵魂中的封建污垢

——读高晓声《79小说集》断想…… 李 纪 (114)

这里有他自己的东西

——评高晓声的四篇近作 (摘录)

…………… 陈 辽 刘静生 (119)

贵在真实 勇于突破

——评高晓声近作的人物形象 (摘录)

…………… 徐兆淮 (133)

独树一帜

——评高晓声的小说 (摘录) …… 谢永旺 (137)

对生活和艺术的探求精神

——读高晓声的短篇小说 (摘录)

…………… 董 健 (147)

农民命运的艺术思考

——谈高晓声的四篇小说 (摘录)

…………… 李 星 (151)

水总要向东流

——初读《水东流》 (摘录) …… 伊 新 (157)

高晓声小说的幽默风格初探 (摘录)

…………… 沈国芳 高 虹 (161)

二、其它

关于近年来文学创作的主流及其它

——在一九七九年获奖短篇小说座谈会上的

发言 (摘录) …… 冯 牧 (170)

小说史上光采的一页

——一九七九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评奖（摘录）	
.....	阎 纲（171）
赵树理创作流派的历史贡献和时代局限（摘录）	
.....	楼肇明 刘再复（172）
所谓“政治学”的评论标准	
——谈对当代人物形象评论中的一种	
偏向（摘录）.....	包忠文（174）
对一些文学观念的探讨（摘录）.....	王 蒙（176）
也谈“深入生活”（摘录）.....	夏 衍（177）
走创新之路	
——兼评一九八〇年上半年的几个短篇小说	
.....	刘剑青（178）
以文会友	
——记黄山笔会（摘录）.....	胡永年（179）
从阿Q到冯么爸	
——读《乡场上》随想（摘录）.....	竹 蔗（180）
让生活变得更加美好（摘录）.....	王 蒙（182）
从思想到艺术的突破	
——谈谈一九八〇年的小说创作（摘录）	
.....	刘锡成（183）
新探索 新突破 新成就	
——一九八〇年短篇小说简评（摘录）	
.....	蒋守谦 沈太慧（184）
一点想法（摘录）.....	茹志鹃（185）
一九八〇年得奖短篇小说的一瞥（摘录）	
.....	李清泉（186）

文学要给人民以力量

——在一九八〇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评

选发奖大会上的讲话(摘录)……周 扬(187)

我愿做啦啦队的一员(摘录)……姚海兴(188)

植根在农民群众中

——记作家高晓声……祖丁远(189)

高晓声著作目录索引……(190)

一、小说

二、创作谈

高晓声研究专文目录索引……(192)

曲折的路

高晓声

1

我的家，在长江以南，沪宁线中段以北，是一块富饶的地方。清朝时候，中国文学界有所谓桐城派，阳湖派；我的家乡，就是阳湖派的诞生地。可见文化经济，都极丰茂。

我小时候，家里有九亩多地，三间瓦房；勤劳操持，粗衣素食，可图温饱。农民有句谚语，叫做“十亩三间，天下难拣。”我好象很满足了。记得七、八岁的时候，有一次母亲问我说：“你看看，我们家好过呢，还是不好过？”我不加思索回答说：“不算不好过，也不算好过。”由此可见，我是个无忧无虑的小家伙。后来我才知道，家里其实是很困难的；父亲是个语文教员，经常失业，又不大会种田；弟妹们倒一个个从娘肚里滚下来，经济内亏已极，门面已很难撑持。我外公家住在附近小镇上，开一片中药铺。我母亲便把我送了去，一方面可以在小镇上的学校里读书，另一方面也减轻了负担。

那时候，镇上有一片专门出租连环画的书店。我很快就爱上了它。每天上学去，总要扭股糖似的揪住外公讨两个铜板；放学以后，就直接从学校上书店，租了连环画坐

在书店的门槛上（那里暗得最迟），一直看到天黑才回去。如此过了几年，我的脑子里就装满了各式各样的故事。暑、寒假回乡下家里去后，就把这些故事讲给小伙伴听。一个故事，讲着讲着，往往有些地方忘记了，就自作聪明用别的故事里的情节凑上去。小伙伴们那里知道，还称赞我讲得好。我很得意，认为自己有天才，将来做个编故事的倒不坏。

不久抗战开始，家乡沦陷，小镇上时时有鬼子来捣乱，不及乡下安稳，我就又回到了乡下家中。这时学校也没有了，我父亲就在村子上办私塾。我开始接触文言文，记得父亲教我的第一篇古文，竟是蒲松龄著《聊斋志异》中的《促织》。之后我就爱上了蒲松龄，《聊斋志异》是我少年时代读得最熟的一本书。我家里有一部版本很好的《聊斋志异》，在不懂的词语底下都注有解释，我几乎就是靠了这本书学通了文言文。

从那时候开始到初中毕业，我看过许多小说，各式各样都看，既有《红楼梦》、《水浒》那样的名著，也有《济公传》、《四才子》那样的俗物。我也说不出我究竟受了些什么影响，不过爱好文艺的习惯已经养成了。现在回想起来，觉得许多旧小说中，往往都有写得好的篇章，例如《说唐》中“贾家楼”一段，《岳传》中“小教场上夺魁”一段，笔法极其精彩，至今对我的创作都有影响。我还认真地自学过《纲鉴易知录》，也是当小说看的，但对我注意语言的精炼是有影响的。

由于有这种功底，我在学校里的语文成绩当然很好。每写成一篇作文，老师总要称赞。于是我就认为将来长大

了，当然要当文学家。

想不到就在这个时候，我的母亲生了重病，无钱求医，竟逝世了。临终之前，把我叫到床前，嘱咐我说：“孩子，我们家里穷，我死之后，不会有钱给你读书了，你不要吵，叫你在家种田，你就种田；能够有人介绍你去学生意，你就去学生意。”

那时候我刚满十四岁，听了这种话，心里非常难过；但看着一群弟妹，特别是两岁的弟弟铁生（后来也死了），还天真地偎依在母亲怀里，我凄惨悲恻，呜咽着答应了。我觉得从此再也不能当文学家。

之后不久，我读到了郑板桥的一首诗，题目忘记了，但诗却至今从未忘记过。他写道：“我生三岁我母无，叮咛难割襁中孤，登床索乳抱母卧，不知母歿还相呼。”我的幼小的心灵里发生了巨大的悲恸。因为他如此逼真地写出了和我相同的情景。这是我第一次深刻认识到文学的感人力量。也许就是这一首诗，使我觉得不能再和文学分离了。

2

然而接下来是一连串艰难的日子，当时整个农村经济已濒于破产，我家已经到了吃不饱、穿不暖的地步。我的父亲投靠国民党，钻到宜兴山里去抗日。他有一些朋友在家乡中学里当教员，我就到学校去鬼混，不但交不起学费，连伙食费也拖欠，有一段时间，我甚至连衣服都没有穿，是靠一些同学的周济生活的。那时我其实没法认真读

书，也很少去想到前途，要当文学家的念头，好象变成了一个愈来愈远的幻梦。从初中读到高中，我前后失学过三次。抗战结束后，我父亲当了个国民党的一个小官，经济上却还是很难过。好不容易，读到高中毕业。考大学想考文学系，我父亲不许，要我考工科。说文学系毕业出来就是失业，没有饭吃。我知道我考不取工科，因为我的英语成绩极差。在沦陷时期，我有一种狭隘的心理，抗拒学外国语。认为那是文化侵略，是奴化教育。我上了三年日文课，连字母都不识。学英语也是抗拒的。都德的名著《最后一课》，在这一点上对我起了坏作用。后来我进大学读了经济系。那是无可选择的选择，反正是为了将来混饭吃。所以根本就没有认真读。爱好的倒还是文学，始终在做着文学的梦。结果是人在曹营心在汉，一样也没有学出名堂来。况且，那时上大学，也得有钱，每天晚上得到一个小小学里去教夜校维持生活，哪里还有精力用在功课上。出路在哪里？那时候，我也和许多青年人一样，觉得身上被压得太沉重了，在盼望着解放。

3

真是一串心满意足的日子。我参加了革命又被分配去干上了文学这一行。

天空是那样明朗，大地是那样平整，空气是那样芬芳，我的心底是一片光明。我懂了革命的理，我爱上了共产党，我认准了自己要走的路，我下定了决心开步走。

我永远不会忘记五十年代前期那灿烂的艳阳，一切都那样欢快，一切是那样透明，好象每一个同志的头上都有

花环，都有光圈，都那么聪明和善良。

我抓紧时间去学习，在短短几年内我读了数量不少的书，得斯大林文学奖金的作品，高尔基、契诃夫的作品，巴尔扎克的作品，凡有译本的我差不多都读过。其他还涉及到托尔斯泰、莫泊桑、德来塞、马丁·安德逊、尼克索、雨果、梅里美、小林多喜二……等人的作品。我在有意识弥补外国文学及社会主义文学知识的缺陷。

我也大量阅读了延安文艺座谈会以后的中国革命文学作品，如丁玲的《太阳照在桑乾河上》、周立波的《暴风骤雨》、赵树理的短篇小说、欧阳山的《高干大》、柳青的《铜墙铁壁》，以及杜鹏程的《保卫延安》……等等。这些名著，不仅使我的思想、艺术修养有所提高，还因为我从小生长在农村，对农村比较熟悉，所以感受是更为深刻的。就是在这些作品的直接影响之下，我开始创作反映农村生活的作品。

那时候，我计算着每一分钟的时间用到学习上去。半夜半夜沉浸在书本之中，假如看一个戏的演出花四个钟点而读剧本只要花两个钟点的话，我宁可不看戏而读剧本。

我也永远不会忘记，在我开始学步的时候，我周围一些很好的共产党员文学家曾经握着我的手教我写作，一篇篇，一字一句地修改过我的文章。他们在我身上花费了很多心血。我能够写出一些作品来，同他们的辛勤培育是不可分开的。我的这些尊敬前辈和朋友，后来在林彪、“四人帮”时期，无一例外地都受到迫害。他们中间，有的幸还健在，有的则在迫害中牺牲了。想起他们，我的心中非常难过。

那时候我学习写作各种形式的作品，如诗、说唱、短

篇小说、歌剧、电影剧本。当时受到读者欢迎的是短篇小说《解约》和大型锡剧《走上新路》（和叶至诚合作）。这些作品，基本上是继承了现实主义的传统。但它反映的是社会主义生活，基调是开朗的，方向是明确的。这些作品也反映了我当时思想比较单纯，对党对社会主义完全是一片赤诚之心。

但人总是在进步之中，随着政治思想水平的逐步提高，随着社会生活了解的逐步深入，我开始认识到，社会主义社会虽然是当代世界上最美好的制度，有着无限生命力的制度；但是，我们这个社会毕竟建立不久，还残留着旧社会遗留下来的许多痕迹；我们如何建成社会主义还缺乏经验。因此，在生活中反映出了各种各样急待解决的问题。究竟怎样去正确解决这些问题，就需要我们认真地进行探索。这种想法，现在是任何人都会承认的，是无可非议的。但是，在一九五七年，我基于这种想法，和当时江苏几位青年文学工作者公开筹组“探求者”文学社时，就由于这些主张被打成反党小集团。又因为反映这些主张的“探求者”启事是我执笔的，我就不得不硬着头皮去戴那顶附有紧箍咒的右派帽子。

我被踢出了文学队伍。我在“三十而立”的时候被打倒了。

前进是多么困难呀，那坎坷不平的路！

4

一九七九年三月底，“探求者”错案得到纠正。经过了整整二十一年之后，我又回到文学队伍里来了。

二十一年之前，我还是一个小伙子；现在回来，我已经老了。

二十一年中，除了开头几年，我没有和文学界通过信息，断绝了一切来往。许多人早就以为我死了。而我却还活着，亲眼看到了历史还给我这洁白之身，我实在幸福！

但是，作为我个人的文学生活来说，这二十一年是一个空白。

这空白使我难过，因为我错过了那么多的时间。

这空白也使我高兴，因为它帮助我排除了僵化的、已经走入死胡同里的极左文艺路线的影响。

当我一旦提起笔，我依旧是现实主义者。

而且，人生也终究并不存在空白，即使密封在暗无天日的监狱里，那也还是一种实实在在的生活啊！世界上所有的人，难道不都是带着自己已往的一切经历在进行现在的工作吗！

二十一年来我的生活和思考，自然就成了我创作的源泉。我希望它能成为人民的一笔小小的财富。

五七年以后，我一年一年地努力丢开创作的念头，到文化大革命开始就完全“死”了这条心。我安于其他工作，并且努力作出了成绩。为文学的心死去了，为人民服务的心总不能死去啊！可是，“四人帮”一粉碎，我那创作的念头忽然又升起来，这念头随着拨乱反正工作的进度越来越强烈。这时我才发觉，少年时代在心底点着的火种并未熄灭，现在它得到了燃料和氧，愈燃愈猛烈了。

一九七八年五月，我确认自己不久会回到文学队伍里来。啊，这么多年了，如果一个女儿嫁出去，回娘家应该

带着成年的儿女来了。而我呢，难道能两手空空，光是红着脸羞愧地走进去吗？

我开始握起笔，我开始抢时间。一九七八年六月，我一头钻到创作里去了。开始的时候，我工作得非常困难，我连许多常用字都忘了，找不到词儿去表达内容。我不得不花工夫把辞源从头到尾翻阅一遍，并把我认为有生命力的词汇抄在专用的小本子上。

这一年的夏天非常炎热，而且热的时间很长，我每天写作十八小时左右。身体本来就瘦弱，后来就瘦得不成样子了。《雨花》（80年1月）曾发表我的小说《我的两位邻居》，其中就有一段写到瘦的程度：“课文里有‘精瘦’这个词：什么叫‘精瘦’，以前我只会解释成‘瘦极了’；可是，‘瘦’到什么程度才算‘极了’呢？总还不懂。现在可明白了：只要用手指按住肋骨推皮肤，若推得动，还不算‘精瘦’，要真正推不动，皮贴牢在骨头上，夹层里不再有一点肉，才叫‘瘦极了’。”这就是我当时的真实形象。天见可怜，蚊子那么多，也慈悲地不大来打扰我，因为我身上血太少。我什么也不管，家里的事不问不闻，旁人来同我讲话，我嘴里唯唯诺诺，实际上一点没有听进去。家里人从来没有见过我写作，更没有见过这种样子，爱人以为我在发疯，有时抢走我的笔，责问我“开什么玩笑”！我也没法跟她说清楚。就这样，在三个月左右的时间，我写成了十八万字的一部小说，自己则象患过了一场九死一生的大病。

这以后，我又陆陆续续写了些短篇小说。总算替重返文学队伍准备好了一份薄薄的见面礼。

一九七九年，我在全国一些文学期刊上发表了十一篇小说。这算是我重新恢复了工作。

5

我好象写得很顺利。

也许有人以为，我这二十年来，一定积累了许多素材，笔记本总该装满一箱子，可以取之不尽，用之不竭了。其实，我一个字也没有记，我并不是作为一个作家下去体验生活的。我是去劳动改造的。我根本就没有想到要积累素材去创作。我同一切所谓“走马看花”、“下马看花”、“长期落户”的做法有本质的区别；客观上的强迫，主观上的觉悟，我都是为了改造自己成为一个自食其力的劳动者。我但愿公认我是一个农民，便感到无上光荣，于愿足矣。我达到了目的，不仅使自己成为农民，而且组成了一个地地道道的农民化家庭。这和所有的农民家庭一样，是公社、大队、生产队的一个细胞。我的家庭成员一样参加生产队劳动，一样投工、投资、投肥，一样分粮、分草、分杂物。家里的陈设也和农民一样，有必备的劳动工具，有饲养的家禽家畜，有一份自留地需要经营。总之，农民生活中涉及的每一个角落，也都有我的印记。公社、大队、生产队的丰产或歉收，富裕或贫困，措施正确或错误，干部作风正派或邪恶，以及一个政策所起的作用好或不好，我同农民的感受都是共同的。我的命运和他们一样，我们的脉搏在一起跳动，我是农民这根弦上的一个分子，每一触动都会响起同一音调。我毋需去了解他们在想什么，我

知道我自己想的同他们不会两样。二十多年来我从未有意识去体验他们的生活，倒是无意识地使他们的生活变成了我的生活。我不在上，不在下，不在旁，而是在其中；这也许是我写起来比较自由的原因。因为我并不单是在写他们，为他们说话，也是在写我自己，为自己说话。我写的那些小说，如《李顺大造屋》、《“漏斗户”主》、《陈奂生上城》，既是客观的反映，也都有我自己的影子。我不光看到过那些李顺大们造屋的困难，我自己也有这焦头烂额的经历。我不光看到“漏斗户”主们揭不开锅，我自己也同他们一道饿着肚子去拚命劳动以争取温饱的生活，同他们一起挺直了腰板度过那艰难困苦时期。所以我说：“我写他们，是写我心”。我恢复工作以后，也确实睡在五元钱一夜的高级招待所的床上难以入眠，因为我不能不想起陈奂生们的生活。我习惯于和他们一样去看问题了。我现在离开了他们，就象我在短篇小说《系心带》中写的那样：“今后我不管到哪里，我会想起这里永远是我的起点，我和他们将永远是千里姻缘一线牵，这根红绸丝带将随时传递双方脉搏的跳动。”

我象是“无意”插的“柳”，“塞翁”失了“马”，难到绝顶，才知这“难”也难得；穷到极点，竟发现“穷”也有用。真是半生生活活生生，动笔未免也动情。所以，我的工作方法，很不科学，一写小说，情绪激荡，就吃不上，睡不着，日夜不安，灵魂不得安宁。一直到小说完成，才会定下神来。所以，每写一篇小说，等于生了一场病。

这活儿真难干，可是我不知道为什么还迷恋它。假使

我丢开不写，一定能活得寿长些。

一九八〇年二月，《人民文学》发表了我的小说《陈奂生上城》，陆文夫同志告诉我，他爱人看过后说了这样一句话：“高晓声活不长的！”

这句话是我五十二年来受到的最高称赞。就凭这一句话，我愿意少活几年！

1980.5.5

（《四川文学》1980年第9期）

关于高晓声

章品镇

从1972年起，大家生活得稍微松动了一点。许多老朋友或多年异地的同志，现在又来碰头了。当然，谁都深知一言一动的分寸，不敢稍有逾越。我当时是有重病缠身，因祸得福免掉了“下放”的一课，住址也无变动。因此，外地来的同志们，就常有枉驾见访的了。这时，忘记了是谁告诉我的，说是“高晓声死了！”哦，高晓声也死了。这有什么惊奇的呢？听说田汉、老舍、邵荃麟、赵树理等等死了，大家不就只“哦”了一声。因为依照当时的“革命”标准，这些人，都是应该引颈就戮的。即使未死的人，

不都也在考虑：今后如何还在未知之天呢！所以听说老高死了，并不觉得意外。虽然我也想，以高晓声的聪明，这些年来，该已学会趋吉避凶、苟全性命；但是他那顶虽已摘了的帽子，至少在江苏都有些名气，健康情况又是如此之糟，要过这一关确也困难。因此每逢与他也熟的客人，我都要传播：“咳，高晓声死了！”

这样，又过了四年多，到了1978年底，突然收到了高晓声的来信。说是听到我身体很不好的消息，不知是什么病、究竟如何了？情意拳拳，感我肺腑。又说了他自己1963年以后的大概情况。总之，人还活着，只是丢了半边肺。于是，我又逢人更正过去的误传，一面又通起信来。

我同老高认识、在一起工作，是1950年，那单位是苏南文联筹委会，住在无锡市的新生路上。那时，我未满三十，他是二十出头。我颇有点以老大哥自居的。在一起的青年还有1957年以“桀骜不驯”著称的陈椿年和后来成为我老婆的沈，等等。说以老大哥自居，说具体一点，对陈和沈是如此。对高晓声并不全对。我有些感觉，他要比我深、比我细、比我会办事。当时虽说是一个大学未毕业、刚参加革命的青年，从外貌看，也已经是个小老头了。手指上夹根香烟，总是似含深意地面带笑容。对于人生，他似乎总是有所觉察，有所领悟，颇使人高深莫测。一口慢吞吞的常州土白，说来有板有眼、有滋有味，叫人有种吃糯米蒸糊的感觉。总之，即从说话，我也觉得他沉着得很。有次，同他说笑话：你们常州人都是这样说话的吗？我看瞿秋白、张太雷、恽代英就不会象你。他笑笑，晓得不需要申辩。陈椿年和沈常骂他是“阴世里秀才”。骂他，他还